

论《公孙龙子·迹府》的成书时代

郑良树

《迹府》叙述公孙龙行事，与后五篇备载其思想内容截然不同，可知本篇与后五篇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部分。本篇文字仅三段，首段为开场白，简单介绍书主的身份，并且扼要地概述其思想理论，约一百五十字；第二、三段为书主事迹两件，都是书主与孔穿的答问，前段短，后段长。

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本篇乃附加文字，不是原书所有，所以，有的学者将它改入附录内^①。然而，所谓后人所附入，是后到什么时候？这个加入者是谁？如果像一些学者所推测的，后至唐代，那么，加入者显然存心造伪，这篇文章也就没什么意义了。相反的，如果是编书的“后人”所加，在他纂集本书时，采摭有关公孙龙事迹附入书中，那么，意义却又完全不同了。因此，本篇作成时代的考订是判定本篇性质的关键。关于这个问题，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：

第一、袭自《吕氏春秋》

刘汝霖认为本篇“不过汉代编书者由《吕氏春秋》一类书采入，而加增首句，作为传记，置于第一篇”^②；《吕览·正名》有一大段文字与本篇雷同，所以，刘汝霖有此说。近人萧登福以为第三段“篇中有关齐王、尹文之记载，当是承自《吕氏春秋》而来”^③，说法与刘汝霖相同。

第二，袭自《孔丛子》

谭戒甫认为本篇第三段乃“由《孔丛子》抄袭而成”^④；王琯认为本篇第三段时代颇晚，编纂者“与伪《孔丛》者同采取”“他籍”，编入篇内^⑤。

认为抄袭自《吕览》的学者，都把本篇编成时代订在战国末或西汉初，刘汝霖说是“汉初”，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。此外宋祚胤以为“本篇是秦统一六国以后的公孙龙学派中的人为公孙龙写的一篇传记”^⑥，徐复观谓“就《迹府篇》之重要内容与其有关之资料，加以比较、考查，可知当系战国末年或西汉初年，名家后学为公孙龙所编之素朴传记”^⑦；虽然二人未明举证据，都认为本篇成于战国末或西汉初年，大概基于篇内文字有与《吕览》雷同的关系。认为抄袭自《孔丛子》的，都把本篇编成时代订得很晚，谭戒甫说：“前段为后汉桓谭所作，后段……或唐人所增。”^⑧周骏富订为“汉以后，南北朝以前”之作品^⑨，阮廷卓订为“（唐）显庆三年至咸亨二年”^⑩时人所撰；将成篇时代订得这么晚，恐怕都与篇内文字与《孔丛子》重复有关。

本篇第二段载公孙龙与孔穿对话，公孙龙引述孔子论楚王丧弓的故事，曰：

楚王张繁弱之弓，载忘归之矢，以射蛟兕于云梦之圃，而丧其弓。左右请求之。王曰：“止。楚人遗弓，楚人得之，又何求乎？”仲尼闻之曰：“楚王仁义而未遂也。亦曰：人亡弓，人得之而已，何必楚？”

这则故事又见于《吕氏春秋·贵公》、《说苑·至公》、《孔子家语·好生》及《孔丛子·公孙龙》，文略有不同。《吕氏春秋》时代早，可能是本段的出处；《说苑》、《孔子家语》及《孔丛子》时代虽晚，如果本篇是后人蓄意造伪的，却也可能出自这三书；所以，在没有进一步考证之前，我们无法从它们成书的先后来判定本篇的时代。

在这四部书中，《吕览》那一则最特别，原文曰：

荆人有遗弓者，而不肯索，曰：“荆人遗之，荆人得之，

又何索焉！”孔子闻之曰：“去其荆而可矣。”老聃闻之曰：“去其人而可矣。”

在这则简短的文字里，编者只标明荆人的故事，与本篇本段明言楚王有相当大的不同；除此之外，在孔子言论之后，又引了老聃“去其人而可矣”一句话，见解比孔子更高一筹，有意“压倒”孔子，为本段所无；显然的，《吕览》作者所看到的材料和本段有很大的不同。《说苑》的文字就比较详细，原文为：

楚共王出猎而遗其弓，左右请求之，共王曰：“止。楚人遗弓，楚人得之，又何求焉。”仲尼闻之曰：“惜乎其不大，亦曰：人遗弓，人得之而已；何必楚也！”仲尼所谓大公也。

刘向知道这是楚共王的故事，显然的，他所依据的材料比《吕览》丰富；《说苑》缺乏老聃那句话，更可证明刘向并不根据《吕览》，否则，在《至公》内，刘向尽可录《吕览·贵公》这段文字，更符合篇章的题旨，何况《吕览》缀尾还有“至公”二字。根据这些事实来观察，在先秦时代，这故事应该有两个流传系统，一个是《吕览》所根据的，缀尾有老聃语；一个是《说苑》所根据的，明言为楚共王事。

本篇本段似乎与上述两种样本不同；第一，它说：“张繁弱之弓，载忘归之矢，以射绞兕于云梦之圃。”行文颇有骚赋铺排之风，可见其时代比较晚；第二，上述两样本引仲尼语都只言楚王未能破除“楚人”的局限，本段引仲尼语除申述此点外，尚批评楚王“仁义未遂”，将孔子的“仁”与孟子的“义”结合在一起，批评内容显然比前二本增多且丰富。据此而言，本段时代应在前二本之后，时代当在秦一统天下之后，或竟是西汉初年了。

至于第三段，问题就比较复杂。其文字虽与《吕览·正名》极为相似，然而，谭戒甫认为本段乃“由《孔丛子》抄袭而成”，王琯也有此倾向，阮廷卓更把它订在唐朝。如果本段乃唐人据《孔丛子》伪造，那么，也就是说本篇为唐人所编入，则本篇的价值

及意义就逊色甚多。

第三段分两小节，我们打算只讨论前一小节。这前一小节的文字，和第二段的前半部有很多雷同之处，而它们同时也与《孔丛子》相近，所以，造成因袭的复杂问题。到底是第三段前半截抄自《孔丛子》？还是《孔丛子》该节文字抄自本篇第三段前半截？

《孔丛子》：仆居鲁，遂闻下风，而高先生之

本篇第二段：素闻先生高

本篇第三段：臣居鲁，侧闻下风，高先生之行也，愿受业之日久矣。

谊，愿为弟子久

智，说先生之行，愿受业之日久矣，乃今得见然所不取于先生者，独不取先生，以白马为非马尔

但不取先生，以白马为非马耳

。然所不取先生者，独不取先生之以白马为非马耳

。诚去非马之学，则穿请为弟子。”公孙龙曰

：“请去此术，则穿请为弟子。”龙曰

：“请去白马非马之学，穿请为弟子。”公孙龙曰

：“先生之言悖也，龙之学，正以白马非

：“先生之言悖，龙之所以为名者，乃以白马

：“先生之言悖，龙之学，以白马为非

马者也。今使龙去之，则龙无以教矣。今龙无以

之论尔。今使龙去之，则无以教焉。

马者也。使龙去之，则无以教。无以

教而乃学于龙，不亦悖乎？且夫学于龙者，以

且欲师之者，以

教而乃学于龙也者，悖。且夫欲学于龙者，以

智与学不逮也。今教龙去白马非马，是先教也。

智与学不如也。今使龙去之，

智与学为不逮也。今教龙去白马非马，
先教而后师之，不可也。

此先教而后师之也，先教而后师之者，悖。
是先教而后师之也，先教而后师之，不可。

将这三段文字仔细对比之后，我们发现：

第一，《孔丛子》文字基本上和本篇第三段相同，两者关系非常密切，存在着互相抄袭的痕迹。比如《孔丛子》“今龙无以教而乃学于龙，不亦悖乎”，本篇第二段无此二句，《孔丛子》显然与本篇第三段关系密切；又比如《孔丛子》“且夫学于龙者”，本篇第二段作“且欲师之者”，第三段作“且夫欲学于龙者”，《孔丛子》显然与后者极有关系。此类例子，为数颇多。

第二，《孔丛子》“而高先生之行也”，本篇第三段作“高先生之智，说先生之行”；是《孔丛子》将两句合并为一句加以简化呢？还是本篇第三段将一句铺衍为两句加以增饰呢？以常理来说，前者容易，后者就比较困难，而且很少有此必要。根据这一现象，我们应可以断定，《孔丛子》在本篇之后，是《孔丛子》抄袭本篇。

第三，除前文指出《孔丛子》基本上和本篇第三段相合之外，实际上，《孔丛子》也采录第二段的文字，比如《孔丛子》“则穿请为弟子”，“则”字与第二段合；又比如《孔丛子》“今使龙去之”，“今”字亦与第二段合，此种现象说明什么呢？本篇这两段重复的文字都来自《孔丛子》吗？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呢？如果说《孔丛子》将本篇这两段重复文字合抄在一起，以第三段为基础，也兼采第二段文字，那就比较合理了。

本段既然不出自《孔丛子》，那么，它的时代就应该比较早。它应该出现于何时呢？《吕氏春秋》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。本段除上述前缀文字外，尚有两小截文字，前半截和《吕览·正名》相接近。兹对比如次：

《吕览》：尹文见齐王，齐王谓尹文曰：“寡人甚好士

本段：

齐王之谓尹文曰：“寡人甚好士。
尹文曰：“愿闻何谓士。
，以齐国无士，何也？”尹文曰：“愿闻大王之所谓士？”
王未有以应。尹文曰：“今有人于此，事亲者。”齐王无以应。尹文曰：“今有人于此，事君则孝，事君则忠，交友则信，居乡则悌。有此则忠，事亲则孝，交友则信，处乡则顺。有此四行者，可谓士乎？”齐王曰：“此真所谓士已四行，可谓士乎？”齐王曰：“善！此真吾所谓士也。”尹文曰：“王得若人，肯以为臣乎？”王曰：“所。”尹文曰：“王得此人，肯以为臣乎？”王曰：“所愿而不能得也。”尹文曰：“使愿而不可得也。”是时齐王好勇，于是尹文曰：“使此若人于庙朝中，深见侮而不斗，王将以人广庭大众之中，见侵侮而终不敢斗，王将以为臣乎？”王曰：“否。夫士见侮而不斗，则是为臣乎？”王曰：“矩士也？见侮而不斗，辱也，辱则寡人弗以为臣矣。”尹文曰：“虽见侮而辱也，辱则寡人不以为臣矣。”尹文曰：“唯见侮而不斗，未失其四行也。未失其四行者，是未失其所以不斗，未失其四行也。是人未失其四行，其所以为士一矣。未失其所以为士一，而王以为臣；失其为士也然。而王一以为臣，所以为士一，而王不以为臣，则向之所谓士者，乃士一不以为臣，则向之所谓士者，乃非士乎？”王无以应。
乎？”齐王无以应。

逐字对比这两段文字后，我们发现：

第一，本段较完整

本段有“以齐国无士，何也”七字，因为齐王说齐无士，尹文才问齐王“士”有何条件；本段有“是时齐王好勇”六字，为下文尹文论勇张本，据此，可知本段比《吕览》完整。

第二，本段另有源头

本段虽与《吕览》极为相似，然而，本段并非抄录自《吕览》，理由有二：首先，本段有冗余文字，如“愿闻何谓士”，本段作“愿闻大王之所谓士”；如“此真所谓士已”，本段“所谓”上多一“吾”字，这些例子，都显示本段文字烦冗多余。本段若抄自《吕览》，抄者没有理由增加这些冗余的文字。其次，本段与《吕览》往往出现义同字异的现象，如“王未有以应”，本段“未有”作“无”；“王得若人”，本段“若”作“此”；“所愿而不能得也”，本段“能”作“可”；“辱则寡人弗以为臣矣”，本段“弗”作“不”。除上述字眼不同外，句子内其他用字全同。此类例子，为数尚多。本段若抄自《吕览》，抄者何必作此义同字异的更易呢？比较合理的推测是，本段另有源头，抄者维持其原貌，所以才出现这些冗余及不同的文字。

第三，本段比较简练

本段“其所以为士也然，而王一以为臣，一不以为臣”，比《吕览》“是未失其所以为士一矣。未失其所以为士一，而王以为臣；失其所以为士一，而王不以为臣”简练^①。所以，《吕览》“未失”四见，本篇仅二见，避开重复啰嗦。

第四，本段调整语序及内容

《吕览》“事亲则孝，事君则忠”，本段作“事君则忠，事亲则孝”，将“君”置于“亲”之前，先国而后家，语序比较合理。《吕览》“交友则信，居乡则悌”，“悌”指兄弟间的爱，“居乡”而言“悌”，用字欠佳，本段作“处乡则顺”，所言比较合理。本段忠、孝、信、顺，由君而亲、而友、而乡人，次第有序，比《吕

览》孝、忠、信、悌更有次第。

根据上述四种情形来考察，本篇本段的原始材料虽然在《吕览》之前，不过，入编本篇本书时应该在《吕览》之后，抄录者应该看过《吕览》，并且根据《吕览》调整内容。

根据前文的分析，即知本篇的作成时代应该是在《吕氏春秋》之后，最迟在西汉初期以前。那时，本书的编者在纂集本书五篇作品时，为了介绍公孙龙的生平事迹，乃在公孙龙诸多事迹文字当中，采纳了两段文字，并且据《吕氏春秋》作了轻微的改易调整，然后编入本书卷首。这样的说法应该是符合事实的。

注：

①见杨柳桥著《公孙龙子校解译诂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，1988。

②刘著有《周秦诸子考》，笔者未见其书，转引自张心澂编《伪书通考》，页790。

③见萧著《公孙龙子与名家》，文津出版社，台北，1984，页32。

④⑧见谭著《公孙龙子形名发微》，北京中华书局，1956，页7。

⑤见王著《公孙龙子悬解》，北京中华书局，1992，页32。

⑥见宋著《公孙龙子译注与辨析》，湖南教育出版社，1990，页1。

⑦见徐著《公孙龙子讲疏》，台湾民主评论社，1970，页2。

⑨见周撰《公孙龙子文例》，原刊于《台湾省立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集刊》第二期内；又见于拙编《续伪书通考》，台北学生书局，1984，页1569—1570内。

⑩见阮撰《论今本公孙龙子出现的年代及其真伪》，在《续伪书通考》内，页1573—1579。

⑪《吕览》此处文句，学者颇有不同看法，陈昌齐及俞樾皆认为“而王以为臣失其所以为士一”十二字当衍，谭戒甫则认为当据《迹府》改作“未失其四行者，是未失其所以为士矣。未失其所以为士，而王一以为臣，一不以为臣，则向之所谓士者乃非士乎”。